

周作人与立教大学

〔日〕波多野真矢

周作人留学日本是和其兄鲁迅留日同样有名的,但鲁迅留日的情况已为研究家们详细记叙考证,周作人的留学经历则还少有人来谈及。笔者自2000年4月起在周作人留学的立教大学担任讲师,又刚好要发表题为《周作人与京剧》的论文,便想到顺便也调查一下周作人在立教的事情。承蒙大学教务部和图书馆大学史资料室的帮助,竟然找到周作人的学籍簿和成绩单,令我喜出望外。这时,应国际交流基金邀请来日访问的孙郁先生敦促我及时把此事报告给中国的研究界,于是勉力草成这篇小文。说不上是研究,就只是一种简单的说明而已。

关于立教大学

首先应该介绍立教大学的历史。1858年(安政五年)德川幕府批准签订“安政五国条约”,从而结束了日本长达二百多年的锁国政治。根据条约,欧美国家可以在日本设置“居留地”,外国人在“居留地”内享有永久租地权和自治权。这就和中国所说的“租界”是一样的了。

在东京的筑地,即现在的明石町一带,即被划为租界,修建起外国公使馆、教堂、医院、学校,成为西洋式建筑林立的外国人街,仿佛老北京的东交民巷似的。

欧美人士随之大量涌入日本。受美国圣公会派遣的传教士威廉姆斯(Channing Moore Williams)本来是在清国上海传教,据说他只

用了两个月时间便学会汉语。威廉姆斯这时又赶在日本开国之初抵达长崎,后又到大阪。1873年他来到东京,次年就在筑地的租界创设了“立教学校”,最初仅有五名学生。以后他又陆续办起“三一神学校”、“立教中学校”、“立教女学校”、“志成学校”等多所学校和几座教堂,因此在租界享有很高声望。

“立教学校”于1883年改称“立教大学校”。1894年东京大地震毁坏了“大学校”的建筑,又在原中学校、三一神学校附近重建“大学校”。1907年根据政府有关教育法令得到认可,“大学校”设置文科与商科两大学



立教大学创始人威廉姆斯

部,每个学部又包括预科和本科两部分。周作人留学是在震后重建的新校舍,他考取商科预科,入学时间是1909年(明治四十二年)4月10日。至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4月18日因家事而退学,他在立教的时间整有两年。

法政大学预科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学日本语》中说,“……在第二年便是丁未(一九〇七)年的夏天,又改进了法政大学的特别预科。这种预科期限一年,教授日文以及英算历史浅近学科,学了之后可以进专门科;若是要进大学本科另有一种预科,学习普通中学课程,须三年工夫才能毕业。”

周作人学籍簿有“入学前”一栏,登记的是“明治四十一年(一九〇八)七月法政大学清国留学生预科修了”。

由此可以知道周作人说的“特别预科”,即是指清国留学生预科。

保证人蔡元康

周作人学籍簿“保证人”一栏,填写的是蔡元康,三十岁,和周的关系是“知人”(熟人、友人之意),住址是“四谷区东信浓町十番地”。

蔡元康其人,《知堂回想录》里也有几处提到。

一是《徐锡麟事件》。周作人在本乡区汤岛二丁目伏见馆居住时,“到了第二年(一九〇七)的春天,忽然的来了新客,……来客非别,乃是蔡谷卿君夫妇;蔡君名元康,是蔡鹤卿即子民的堂兄弟,经常在‘绍兴公报’上面写些文章,笔名国亲,与鲁迅本不熟识,是邵明之所介绍来的。蔡君是新近才结了婚,夫人名郭珊,她的长姊嫁给了陈公猛,即是陈公侠的老兄。二姊是傅写臣的夫人,这时同了她的妹子来到日本,要进下田歌子的实践女学校;可是就生了病,须得进病院,而这病乃

是怀了孕。她那一方面是由邵明之照料,弄得做翻译的十分狼狈,时常来伏见馆诉说苦况。”

二是《法豪事件》。“老实说,下宿生活不会是住得痛快的,寓居的人既然杂乱,吵闹势所难免。但伏见馆的情形还算好的,因为它房间少,住不到十个人,而且多数是岩仓铁道学校的学生;虽然志趣很低,为鲁迅所看不起,却还是专心用功;整天上学,晚上也很安静,所以一时可以共处得来。可是后来蔡君夫妇搬到别处去了,我也另外找了第七号住下,这边第五六号来了几个江西客人,这情形便大不相同了。”蔡元康夫妇比周作人早搬出伏见馆,所谓“别处”,也可能就是东信浓町吧。

从这两处看出周对蔡较为了解,而且“可以共处得来”,以致在分别搬出伏见馆后还保持联系。

再有两处就更有趣。见于《翻译小说(上、下)》。1907年2月鲁迅、周作人译成《红星佚史》,“那时还住伏见馆里,抄成后便寄给商务印书馆去看,回信说可以接收,给予稿费二百元;还要一个卖稿的中保人;这时我们恰好便请蔡谷卿做了,因为他是场面上的人物,是最好没有的了。”可见蔡刚到日本就为周氏兄弟作过保人。

另一处,商务印书馆同意支付《红星佚史》稿费二百元,“这是很不小的一个数目,似乎可以买到好些外国书了。在钱还没有寄来之前,先向蔡谷清(卿)通融了一百元,去到丸善书店买了一部英译屠介涅夫选集,共有十五本。”这就越发表明周作人和蔡元康之间关系的亲密。不知后来周氏兄弟和蔡元培相识,是否有蔡元康在中间介绍?如果确有,那也在意想之中的。

关于罗象陶

周作人学籍簿登记:

姓名:周作人

本籍族:清国浙江省绍兴府替日县

居所:本乡区西片町十

生年月日:光绪十二年十二月

替日县当是会稽县之误。又,周作人于1908年4月8日从东竹町的中越馆迁居的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周初时住在“吕字七号”,即“伍舍”;后于1908年初冬搬至“波之十九号”。他在这里住到1910年11月。周的生日却和《知堂回想录》中所说的“光绪十年(一八八五)甲申十二月”不一致。可能是出于登记者的笔误。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中提到先于他进入立教的清国留学生有罗象陶:

“……立教则以前只有过一个罗象陶。不过我进去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里了,虽然他似乎还在留学,却不知道在干什么。他是龚未生陶冶公的朋友,大概也是在搞革命;民国以后听说他因此很失意。我曾给他遗札题字,表示悼惜之意,这手札是陶冶公所藏的。其文云:

‘光绪末年,余寓居东京本乡,龚君未生

时来过访,辄谈老和尚及罗黑子事。曼殊曾偕未生来,枯坐一刻而别。黑子时读书筑地立教大学,及戊申(笔者按:此处系周作人误记,应是己酉)余入学则黑子已转学他校,终未相见。倏忽二十年,三君先后化去,今日披览冶公所藏黑子手札,不禁抚然,有今昔之感。黑子努力革命,而终乃鸟尽弓藏以死,尤为可悲,宜冶公兼士念之不忘也。民国廿三年三月十日,识于北平。’”

在立教大学的学籍簿上,周作人是第三号清国留学生。罗象陶是第一号。罗的学籍簿上登记:罗生于明治二十一年(1888)二月十九日,居所是小石川区大冢町五十。保证人是他的亲属孙钟,也住在大冢町五十,和罗的地址相同。罗明治四十一年(1908)三月在支那青年英语学校结业后,4月1日没有经过考试而进入立教选科(从规定学科里选择一部分学习的课程,次于本科。)但罗仅在立教读到5月31日就因无故旷课而被开除了。

大约是周对学校事不大留心或是因年代久远而记忆有误(他在日时没有日记),在第

周作人学籍簿登记表

備考		事徵 故兵		前學入		籍除		學入		號三第		氏名	
		其他		學校		種類		年月日 年級		年級		年月日	
				明治四十二年七月法政大學清國留學生事務所		退除籍		明治四十四年四月十八日		商科豫科		明治四十二年四月十日	
				事由 家事都合						有無 試驗		知人 年 三十才	
										居所 四谷区東信濃町十番地		氏名 蔡元康	
										居所 本郷區片町十番地		清國浙江省紹興府舊日縣	
										月日生年 光緒十二年十二月			

一号罗与第三号周之间,还有第二号,名叫徐大纯,江西赣州府赣县人,明治十七年(1884)十一月二十八日生。明治四十一年(1908)九月三十日考入立教本科,明治四十二年(1909)九月十一日转学他校。即周作人在立教时,立教同时还有一位中国留学生徐大纯。所以,周的“立教则以前只有过一个罗象陶”之说不确的。

附带说一件事,同在《知堂回想录·大逆事件》里,周作人说到“这是明治四十四年(一九一〇)一月廿四日的事,那时正在大学赤门前行走,忽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我就买了一张,拿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了。这乃是‘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

钱理群先生《周作人传》(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9月第1版)也提到这一情节,“那是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日,周作人在立教大学赤门前行走,突然听见新闻的号外呼声,买来一看,不觉愕然立定了。报上所载是关于‘大逆事件’的裁判与执行的消息。”(第158页)笔者谨按:大逆事件发生是在明治四十四年,西历为1911年。1月18日由大审院(当时的日本最高法院)判处幸德秋水等24人死刑。1月19日又将24人中的十二人改判无期徒刑。1月24日对幸德秋水等人执行死刑。周作人说“当时我所看见的号外,即是这一批二十四个人的名单。”那么,他看到号外这一日,就应该是1月18日而不是24日。钱先生也用了“一九一〇年一月二十四”的说法;同时,周文中的“大学赤门”,钱先生说明是“立教大学赤门”,此处还当是指本乡东京帝国大学(即今东京大学)的赤门。赤门是东京大学的标志之一。

学希腊文

周作人进入立教读书主要目的是学习希腊文。他为什么要学希腊文,周作人在以后的文章里多次谈到中国人应重视对希腊的研究,如《略谈中西文学》(1936年4月15日《人

间世》,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下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9月第1版)、《中国的国民思想》(1941年9月1日《教育时报》,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下集》)等等。他的主要观点是,“希腊的古典文化,对于中国的学术上重要的原因,由于希腊文化是西洋文学之祖,无论是科学和文学。并且希腊文化之探讨,比印度、阿剌伯容易了解,因为它和中国的儒家思想相同很多。”“西洋的科学文明发源于希腊罗马,要输入西洋的科学文明,就要了解中古时代希腊罗马的人文科学。从希腊的文明看来,我们觉得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没有什么区别,他的文明又同中国很有相像的地方。”周是否在年轻时已形成这样的认识,现在还无法确认。不过在《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里,周作人又提到他当时“想把‘新约’或至少是四福音书译成佛经似的古雅的。”

不论怎样说,周作人在1908年秋天就开始学习古希腊文了。他想进入学校继续深造。《知堂回想录·学希腊文》里说,“那时日本学校里还没有希腊文这一科目,帝国大学文科有开培耳在教哲学,似乎没有此课。但那最高学府,不是我们所进得去的,于是种种打算,只能进了筑地的立教大学。这是美国的教会学校,校长是姓忒喀(Tucker),教本用的是怀德的“初步希腊文”,后来继续下去的,是克什诺芬(Xenophon)的进军记(Anabasis)。但是我并不重视那正统古文,却有时候还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三一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讲义;这乃是那时代的希腊白话文,是一般“引车卖浆”之徒所用的语言,所以耶稣的弟子那班犹太人都懂得,能够用以著书。”

这段记叙中,需要说明的是,“三一学院”当是“三一神学校”,这个名称就是来自基督教的“三位一体”。那时大学、中学、“三一神学校”等威廉姆斯创办的教育事业还有一个总称,叫作“立教学院”。立教大学和“三一神

学校”同在立教学院的校园内。这就是周作人说“三一学院”和立教大学“有关系”的原因所在。

立教大学第一任校长是美国人亨利·圣乔治·忒喀(Henry St. George Tucker, 1874.7.16 ~ 1959.8.8)。他 1899 年来日,1903 年就任立教学院总理,1912 年离开立教到京都任主教。1923 年返美,成为美国圣公会第十九代总裁主教。周作人在《希腊拟曲二首译者前言》(1916 年 10 月 1 日《中华小说界》,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集)》)中提到,“余译此,深得余师美国泰克氏之助,敬致谢意。”我怀疑此处的“泰克”即是“忒喀”。

周作人在立教的明治四十二年度成绩单上,共有四十一门课程,而他只参加了希腊语一门的考试,总成绩是九十八分。这说明他的希腊语学得确实不错。但是周作人学籍簿写的是“商科预科”,而成绩单上则是注明“文科选科”。这表明周作人在立教期间是改过一回学部的,但是商科在先还是文科在先,现在也还没能证实。周自己是说成“文科”的。

不过,对于他,选什么学部可能是很无所谓的。



立教大学第一任校长亨利·圣乔治·忒喀

(上接第 32 页)

不得的鲁迅。1937 年,陈独秀在《我对于鲁迅的认识》说:“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般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一般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今天,我们研究鲁迅,既不能将鲁迅一味神圣化,也不能随意贬损。应该努力走近鲁迅,阅读鲁迅。鲁迅可以说得,鲁迅并非完人,鲁迅当然有他的不足之处,但是必须如研究任何学术问题一样,不能一言以蔽之、一语以贬之,而不作任何认真的论析。

谈到如何进一步开拓鲁迅研究时,有的学者认为进入新世纪的鲁迅研究应该注意几个方面:1,必须以平视的眼光与心态,去走近鲁迅,靠拢鲁迅,解

于使鲁迅研究趋于神化圣化。2,必须努力回到历史的原点,接触第一手资料,还历史以本来面目。注重历史过程的梳理,或者比得出一个新颖的论点更为重要。3,必须认真阅读鲁迅,可以大胆设想,更要小心求证。4,必须重视鲁迅后期的研究,重视鲁迅杂文的研究,重视鲁迅与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学关系的研究。

有的学者提出鲁迅研究中要提倡一种细致研读文本的学风,而不能过于相信某权威、甚至轻信某些论点,而缺乏自己对于鲁迅的真切阅读感受与理解。鲁迅研究仍然应该将基础的研究与理论的概括结合起来,将微观的分析与宏观的观照结合起来,将鲁迅作品的研究与思想研究结合起来。应当容忍在鲁迅研究中的不同的见解,努力追求一种实事求是的科学的态度与学风。

鲁迅是说不尽的,鲁迅是说得的。鲁迅是过去时的,鲁迅也是现在时的,鲁迅更是将来时的。